

## 一 话说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从字面上讲，一般是指国家或地区间为贸易往来而设立的港口，因而也叫对外贸易港口。但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它指的不是普通的对外贸易港口，而是指通过不平等条约的有关条款开辟的条约口岸。晚清时期还有一部分出于清政府自愿的自开口岸，但它们在很多特征上与条约口岸并没有什么差别。

按照西方学者西甫·里默的观点，条约口岸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在那里，有完全通商的权利，可以设立领事馆，有一个海关衙门”。这一类实际上就是我们后边所说的标准条约口岸。第二类，“在那些城市里，一般是没有海关衙门的，没有领事馆，外国人是应该在那里永久居住的”。这一类虽说亦属口岸，但多数不沿海、甚至也不沿江。第三类，“沿着长江和西江的某些地方，

有所谓访问口岸。在这些商埠，外国公司的轮船可以为着装货载客而在那里停泊，在另外一些这样的商埠，该轮船只能为载客而停泊”。

以上诸口岸，有许多原本是荒芜的海角或渔村，但其中大部分重要的口岸，是由古代的对外贸易港口发展而来的。因此，为了对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我们有必要对一些古代的对外贸易港口作简单的介绍。

## 1. 古代的对外贸易港口

据中国古代的有关文献记载，早在唐宋时期，由于我国海上贸易、交通的空前繁荣和发展，东南沿海的大批港口就已广泛地向外国商民开放了。据统计，这一时期，先后辟为对外通商的港口就有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洪州（南昌）、扬州、镇江、江宁（南京）九处。前来通商的国家也有 50 余国。如亚洲的骠国（缅甸）、空利佛逝、堕婆登（苏门答腊）、诃陵（爪哇）、印度、狮子国、麻嘉（麦加）、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真里富（马来西亚境内）、暹罗（泰国北部）、罗斛（泰国南部）、

蒲甘（缅甸中部）、非洲的勿斯里（开罗）、木兰皮（摩洛哥境内）、层拔（桑给巴尔）等等。

到了清代，除了清初一度为防范郑成功而实行海禁外，其他时间并没有过于严格的限制。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商贾有不同的贸易地点。如在买卖城与俄国互市，在澳门与葡萄牙互市，在滇桂边境与越南、缅甸互市，在东北边境与朝鲜互市，在福建同琉球互市等等。因此，清代的对外贸易港口是很多的，最多时竟达到 100 余处，其中广东 43 处，福建 20 余处，浙江 15 处，江苏 22 处，直隶 1 处，山东 1 处，东北 1 处。贸易往来的范围也扩大至欧洲国家。

由于欧洲国家来华贸易的商民大多肩负着殖民侵略的使命，清政府在诸多对外贸易港口中对欧洲国家开放的数目有限。清康熙年间只开放了澳门（广东）、漳州（福建）、宁波（浙江）、南京（江苏）等 4 处；到乾隆时，更只有广州一港口。而且，就是这一港口也有如下限制措施：

在买卖交易方面，清政府规定外国商人必须与官方指定的“十三行”进行交易。所谓“十三行”，也称公行、洋行或外洋行，是清政府为限制对外贸易而特意组建的垄断组织。这

一组织虽起源于明代的“牙行”，但比“牙行”更严格、更完备。“牙行”只是起到中间人的作用，尚允许外商自行投牙，而“十三行”不仅对官府负有承保和交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文书，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而且，还享有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须经由“十三行”经营买卖。

在居住方面，与唐宋时蕃坊比较自由的形式不同，清政府规定，所有到达广州的外商，都必须到“十三行”的夷馆中住宿，严禁华洋杂居。所谓夷馆，即商馆，是由“十三行”出面专为接待外商而设置的。

在日常生活方面，清政府颁布了《防夷五事》、《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等，对外人进行限制，从规定条文来看，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如禁绝外商护卫兵船进入虎门，禁绝外商任意雇佣内地仆役，外商不得携带火器，不得直接给清朝官宪呈递禀帖，外商货船进港后，必须提出保证人，由保证人承办洋货贸易许可证的申请、纳税等事宜，等等。在条文中，甚至有不许外商女眷在广州过冬的内容。

这些措施今天看来显然有某些过分之处，但其主要方面还是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目

的，并且事实证明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 2. 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

近代以来，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先后开放了 100 余处通商口岸，初期仅限于东南沿海，但很快就从沿海扩展到内地，并由原本彼此孤立的点联成一体，逐渐形成了一个通商口岸城市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列强不仅实现了其侵略、剥削、奴役中国的目的。同时，由于通商口岸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城市网络，拥有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也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将通商口岸与中国的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称为现代中国的钥匙。

这种以通商口岸城市网络为主体引导出的中国近代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道路不相同的。中国的这一发展道路，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以被迫开放为先导的。所谓被迫开放，是指中国的这种开放不是出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所产

生的自然要求，而是迫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压力。

第二，中国社会的发展从长远的历史趋势看，是一波三折的。中国社会的这种发展不是如西方那样是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社会生产力如大江东去，势不可挡，而是在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一个阻止中国发展的机制。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只给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体系以有限的发展空间，超出了这个界限，发展的可能性就被帝国主义列强扼杀，发展也就转化为不发展。此外，这种不发展还突出地表现在通商口岸的某种畸型发展和农村的停滞甚至倒退。

第三，中国的这一发展道路由于其中深埋着不发展的机制，从而阻止了中国成功地向资本主义过渡，但却造成了中国向另一种机制，即社会主义的机制过渡的机遇。而这种过渡的合理性、必然性，是可以从通商口岸体系中找到其清晰的脉络的。

## 二 西方殖民者叩关

西方殖民者打开中国大门的企图是在鸦片战争后才得逞的。在此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尝试。这些尝试可以被认为是最后结果的预演，并预示着最后结果的必然到来。

### 1. 红毛夷东来

最早企图打开中国大门的是葡萄牙的殖民者。明正德八年（1513），一队葡萄牙船悄然驶近中国海岸。从此，一个中外交往的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刚刚抵达中国的葡萄牙殖民者，是早已征服了美洲、南洋的殖民老手。这次，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也企图如法炮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在广东屯门“建立石柱，刻葡萄牙国徽于其上”，初露侵略意图。明正德十二年（1517），

他们第三次来到广东，以武装船只闯入珠江，露出了强盗的狰狞面目。1519年，他们第四次来到广东，竟然“藉词防御海盗，擅置砦栅，又设立绞首台，滥施刑罚，蔑视中国主权，且劫掠行旅，拐诱儿童，抗不纳税，侮及官吏”。但是，在北美和南洋频频得手的老牌殖民者葡萄牙人，在面对地大物博，人民众多，又拥有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大帝国时，就不免显得力不从心了。在当时明朝政府的坚决反击之下，他们不得不败退下来。但是，葡萄牙殖民者是狡猾的，他们见硬的一手不行，就来软的一手，假装驯服，终于骗取了明朝政府对其长居澳门的首肯。

追随葡萄牙足迹而来的是另一些老牌殖民者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新兴的殖民者英国人、法国人等。这些殖民者无不效法葡萄牙人的海盗行径。其中，荷兰人还长期窃据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只是由于民族英雄郑成功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势，才不得不举着白旗，狼狈退出中国领土。

荷兰殖民者虽然在一段时期内相当嚣张，但其主要活动舞台只限于台湾岛，紧随其后的英、法等殖民者，活动范围和侵略野心就大多了。

英国商船从 1576 年起，便开始探寻到东方的航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如愿。1637 年，一个叫威德尔的英国人率领一支船队终于抵达广州，并随即与广州地方当局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还发炮轰击虎门，击沉中国水师船只多艘。虽然，这次武装冲突由于葡萄牙人的居间斡旋得以和平解决，但英国殖民者的出现，给中国历史涂抹了一层硝烟。

从 1637~1700 年 60 余年间，到广州的英国船虽然不多，但英国扩大贸易、征服中国的欲望有增无减，他们软硬兼施，阴谋迭出，企图以派遣外交使团的方式攫取更大的侵略权益。

## 2. 朝北京进发——负有特殊使命的外交使团

1792 年 10 月，英国使团在马夏尔尼勋爵的率领下，乘由“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四条船组成的船队，从伦敦启碇出发，9 个月后，也即 1793 年 6 月 19 日，终于看到了中国的海岸线。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澳门海面上停泊。但马夏尔尼命令船队不许靠岸，因为他希望直接进入中央

帝国，在一个完全属于中央帝国的港口登陆，而不是在澳门这样一个有殖民地特征的港口登陆。他甚至对广州也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北京——中央帝国的首都。因此，他命令船队沿着海岸航行，1793年8月11日到达天津，16日抵达离北京只有12英里的通州。马夏尔尼使团一行离船上岸，坐上马车，于21日抵达他们“渴望已久”的目地——北京。

马夏尔尼这位英国勋爵，在晋见中国皇帝时，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和礼貌，献上了贵重的礼品，但他牢记的是自己的使命。他先是在呈送中国皇帝的国书中提出增进贸易、使臣驻华、保护英人、介绍英国使臣等四点要求。被拒绝后，他又变本加厉地提出六项要求：第一，请求准许英国货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停泊；第二，请求在北京设立商行；第三，请求借珠山（舟山）附近小岛一处，以便英国商人停歇和收存货物；第四，请求在广东省城拨给小地方一处以居住英国商人，或准许在澳门居住之人出入方便；第五，请求准许英商自广东下澳门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第六，请求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

以上六条要求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理所

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方面的严厉驳斥。乾隆皇帝强调：“尔使臣所恳求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守土文武……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枉劳往返，勿谓言之不预也。”虽然这个敕令表现出清政府力求闭关自守、防止中外交往扩大的态度，但这种态度的基本出发点是抵制外国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神圣的主权，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值得肯定。

在清政府的严词拒绝和勒令催逼下，马戛尔尼快快而归。

1814年，英国组织的反法联军经过长期艰苦作战，终于取得了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重新树立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这样一来，英国久已搁置的征服中国、打开中国大门的梦想，重又浮现在英国殖民者的脑海里。可是，此时刚刚结束对拿破仑战争，英国国力损耗很大，恢复尚需时日。同时，中国当时仍是亚洲乃至东方的头号强国，英国政府一时还有所顾忌，不敢使用武力。因此，英国当权者再一次

把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外交途径上。

这一次，英国使团的正使为阿美士德，此人是英王侍从官，英国贵族；副使是当年曾随同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斯当东。此外，使团还请老牌殖民者、著名的中国通马礼逊和德庇时作翻译。

阿美士德使团于 1816 年 2 月 8 日自英国乘船启程，7 月 10 日抵老万山外香山港洋面停泊，随后沿着当年马戛尔尼的航线驶抵天津，8 月 29 日抵达北京。但这一次，由于他们在晋见中国嘉庆皇帝的礼节上与中方有重大分歧，嘉庆皇帝不仅拒绝接见他们，还降旨说：“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

于是，阿美士德使团遭驱逐而踏上归国之路。他们沿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等省，长途跋涉直到 1817 年元旦才抵达广东省城。在他们离开广东省城前夕，清政府还将皇帝给英国摄政王的信按惯例交给了使团。信中说：“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这充分表达了清政府对与英国继续交往兴趣索然。

阿美士德使团虽然由精通汉语的传教士、

中国通任翻译、助手，正、副使也都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但其出使使命却丝毫没有完成，甚至连正式提出要求的机会都没有争取到。这的确令英国政府十分失望，但他们因此也强烈地感受到，用外交方式是难以从中国获得好处的，只有武力，才能为大英帝国开拓新的广阔的市场。1839年伦敦与东印度及中国协会致英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指出：“在这种状态下，我政府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向中国为在华的英商要求较好的待遇：一是屈服，一是用适当的武力，要求中国让步。”事实很清楚，屈服对国力正迅速上升的大英帝国来说，无疑于天方夜谭。他们瞩目的当然是武力。

### 3. 鸦片船驶进了黄埔港

在阿美士德使华失败之后，大英帝国没有立即向东方的“天朝”炫耀自己的武力。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更为便捷的“敲门砖”——罪恶的鸦片贸易。

从乾隆三十八（1773）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数额达1000多箱，此后数额逐年增大，嘉庆年间（19世纪初），每年达4000多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几

年，每年更多达 4 万箱左右。清政府虽采取了措施但毫无效果。为什么在中国政府三令五申严禁之下鸦片输入量还能如此迅速增加呢？这是由于英国鸦片贩子使用了狡猾的手法。

据说，英国鸦片贩子最初是用小船将鸦片运到澳门南面一个叫云雀湾的海湾里，并将此地作为鸦片储存站，秘密进行贩卖。以后，他们进一步与广州官吏勾结，把鸦片密藏于船舱中，直接运到黄埔出售。1821 年（道光元年），新即位的道光帝采取了比以前更严厉的禁烟措施，迫使英国烟贩子把他们的船只从黄埔撤到珠江口外的伶仃洋面上，继续贩卖鸦片。

除了英国人之外，美国人也加入了鸦片贩子的行列。1805 年，驻土耳其麦拿的美国领事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供认，这一年有三条美国船装着鸦片开往广州。此后，美国运往中国的鸦片烟船逐年增多，成为足可与英国鸦片贩子相抗衡的一支力量，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英国鸦片贩子的不满。他们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对于这些新来的美国竞争者，“若不加制止，将严重损害英国的贸易”。据东印度公司估计，1817 年美国运人中国的鸦片达 1900 担，占这一年各国运往中国的鸦片总数

4500 担的 42%。

但美国鸦片贩子所取得的“业绩”，并不仅仅是这些鸦片贩子努力的结果，美国领事的大力庇护也是重要的原因。如 1815 年，中国官方得到消息说，有条美国船带着鸦片泊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遂派遣官员前往查禁；而美国领事威尔考克斯则极力加以阻拦。他把鸦片藏在米、糖和茶叶包下面，把货舱封住，盖了领事的官印，企图逃避清朝官员的检查。清朝官员没有被吓住，仍然坚持打开船舱检查，结果真相大白，威尔考克斯大出其丑。据美国人自己供认，在所有来中国贸易的美国商人中，只有一家美国店不贩卖鸦片。但这个不贩卖鸦片的虔信基督教的商人，不仅没有受到称赞，反而被别的商人耻笑，他的店铺也由此获得了一个“圣郇山（在耶路撒冷城外，是基督教的圣地）的角落”的绰号。

鸦片烟大量走私入口，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道光十一年（1831）监察御使冯赞勋在奏折中明确地指出：“查烟土一项，私相售卖，每年出口纹银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于国用民生，均大有关系。”道光年间，各省已出现“银价愈昂，钱价愈

贱”的现象。如一两白银在道光元年（1821）前后值制钱 1000 文上下，到了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1836~1838），就值到 1300~1600 文了。这种银贵钱贱的状况影响所及，不仅使广大贫民生活日益困苦、窘迫，就是各州县官方也由此出现大量亏空。因为他们以各种名义向百姓征收的税款大多是钱，而向上贡献的则是以银计。此外，清政府“盐务之积疲，关税之短绌，均未必不由此”。被后世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其给道光的奏折中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大英帝国用来叩关的鸦片，终于警醒了中国。

### 三 五口的开放

1838 年底，湖广总督林则徐应召来到北京。经过多次垂询，1839 年初道光帝终于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火速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上任后，立即采取了雷厉风行的禁烟措施，并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从而向世人昭示了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严正决心。

从 1839 年 4 月下旬到 5 月中旬，英国、港脚（印度）、美国商人向清政府呈缴鸦片共计 19087 箱，又 2119 袋，约 237 万多斤。鸦片呈缴上来后，林则徐决定在虎门彻底销毁。

6 月 3 日，林则徐主持了虎门销烟行动。这天，虎门海滩人潮如涌，欢声雷动，场面极其壮观。这样的场面持续了 23 天，终于把二百多万斤鸦片全部彻底销毁。